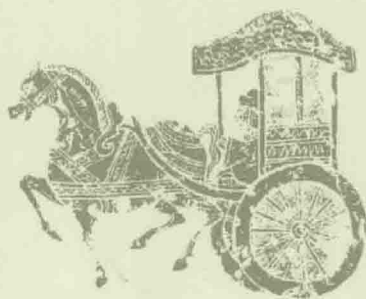


韩非的 治国方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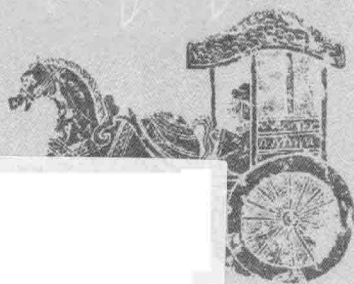
王立仁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5BZZ004

韩非的 治国方略研究

王立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的治国方略研究 / 王立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812 - 2

I. ①韩… II. ①王… III. ①韩非(前 280—前 233) - 政治思想 - 研究 IV. ①B22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840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 鸣
责任校对 徐 楠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221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韩非其人	(1)
二、韩非治国方略解读	(7)
三、关于本书的框架	(9)
第二章 变法图强——社会背景及韩非的志向	(10)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	(10)
二、争霸时期的法制改革	(12)
三、图强时期的法治理论与实践	(16)
四、韩国国势的衰微与韩非的志向	(21)
第三章 循天守道——治理国家的基础方略	(25)
一、循天守道之意蕴	(25)
二、论“道”意在构建治国之基础之道	(32)
三、何以以及如何循天守道	(35)
第四章 因情而治——治理国家的主导方略	(42)
一、因情而治的意蕴	(42)
二、作为主导方略的根据	(44)
三、人情现实扫描	(45)
四、人情善恶论	(53)
五、韩非的人性观	(56)
六、因情而治的举措	(61)
第五章 赏罚二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65)
一、赏罚二柄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的依据	(65)

二、面对好利恶害人性的举措	(66)
三、明君治国之道是虚静参验赏罚	(68)
四、赏罚是治理国家的利器	(69)
五、赏耕战罚违法	(72)
六、信赏必罚是赏罚要坚持的基本准则	(81)
七、赏罚有度不能随意	(84)
八、赏罚无度民偷望易为非	(87)
九、关于赏罚的其他主张	(89)
 第六章 动无非法——赏罚的标准和保证	(93)
一、法的三重意蕴	(93)
二、法及其特征	(96)
三、实行法治的根据	(99)
四、现代以德治国的不良后果	(103)
五、立法简单清楚，权衡利弊	(107)
六、重刑罚少奖赏	(110)
七、严格执法	(114)
 第七章 治吏引纲——治国的关键方略	(117)
一、治国的关键是治吏	(118)
二、治吏最根本的是选用能人为官	(121)
三、选用能人为官的根据	(124)
四、程能授事、因能授官之意蕴	(128)
五、制约能人的基本理念	(132)
六、制约能人的具体举措	(138)
 第八章 务力耕战——治国的根本方略	(144)
一、务力的内容及其手段（耕战和赏罚）	(149)
二、赏罚因事实而据法律（赏罚的标准和保障）	(154)
 第九章 韩非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	(159)
一、韩非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	(159)

二、韩非治国方略的理论渊源	(160)
第十章 韩非治国方略的实效、局限及历史影响和现代借鉴	(177)
一、韩非治国方略的实效	(177)
二、韩非治国方略的局限	(180)
三、韩非治国方略的历史影响	(183)
四、韩非治国方略的现代借鉴	(192)
参考文献	(202)
后记	(205)
附录 作者发表的韩非研究文章	(206)

第一章

导 论

要研究韩非的治国方略，就必须对韩非有个简单的介绍，尽管韩非的读者多半都了解韩非，但从本书结构完整的角度以及铺垫的需要，还是应该对韩非要有个交代。不仅如此，研究韩非的治国方略，还要说清楚什么是治国方略，韩非的治国方略所指及其内涵是什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入对韩非治国方略内容的论述。尤其是，韩非作为一个不得志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治国方略就更需要花费笔墨来解释。

一、韩非其人

研究韩非的治国方略，应该对韩非有个基本的把握，即他是谁？他生于哪年，死于何时，一生都做过什么？这是认识韩非、理解韩非、把握韩非治国方略不能缺少的内容，这对于理解韩非的思想和行为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这看似简单的事，由于时代的久远和资料的匮乏，使我们难以实现这个愿望。目前，除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的《老子申韩列传第三》篇的表述外，再没有能够直接介绍韩非的生平身份的资料。因而《史记》对韩非身份和基本情况的介绍，既是唯一的表述，也是最权威的表述。虽然《战国策·秦策五》和《史记》的其他篇章以及《韩非子》的有关篇章有可以参考的内容，但都没有超出《史记·老子申韩列传第三》的范围。所以，我们对韩非基本情况的介绍，也只能以《史记·老子申韩列传第三》中陈述的内容为线索，做一般性的描述。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具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

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申韩列传第三》

从上面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以下内容：

其一，“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的一个诸公子，这是对韩非身份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表述。至于这个诸公子是怎么样的一个诸公子，他与韩王的关系是远还是近，文中并没有交代清楚，因而也给人们的猜测留下了可能的空间。由于诸公子可以解释为君主诸多公子中的一个，也可以表述为某个诸侯的一个公子，因而有人说诸公子是诸侯的公子，也有人说诸公子是诸多公子其中的一个。在笔者看来，把诸公子理解为韩王诸多公子中的一个比较合适。为什么？一是封建君主在当时可以有多个妻妾，因而就会有多个公子；二是只有是诸多公子的身份，才会有机会数谏韩王。如果是诸侯的公子，一般不会有机会多次上书韩王。而即便是韩王的公子也是庶子，不能是嫡子。

确定韩非的君主诸多公子身份的地位之后，还涉及韩非的出生年份问题。因为韩非的出生年份牵扯到韩非是谁的公子以及年龄问题。目前关于韩非出生年月有两个说法：一个是生于公元前280年，这是钱穆根据韩非与李斯是同学，而韩非出使秦国是韩王安五年，此时李斯在秦国已经15年这一事实的推论（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李斯韩非考》）；另一个是

生于公元前 295 年，这是陈千钧根据《韩非子》中描述堂谿公既与韩非相见又与韩昭侯相见，以及韩昭侯在位年代的推论（《历代韩学述评》自《学术世界》第一卷第十一期，1936 年版）。由于都是推论，都有道理，又都没有确切的根据，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存疑了。好在，这并不影响韩非思想本身。紧随其后的是，韩非到底是谁的公子？这个问题由于前两个问题都属于推论，因而讨论的必要性不大。反正，韩非就是韩王的一个公子。关于韩非的出生年份虽然有争议，但对韩非死亡的年份则没有分歧，确切地知道韩非死于公元前 233 年。韩非死亡的时间之所以没有分歧，那是因为文字记载：公元前 234 年韩非出使秦国，第二年被害死在秦国监狱，这就是韩非死于公元前 233 年的史实根据。

其二，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喜刑名法术之学本身，这很好理解，因为从韩非的论著中就能体现出来。归本于黄老，这在学界略有分歧，分歧之处在于是否有个黄老学派问题，多数人认为有个黄老学派，而也有人认为并不存在黄老学派，只是人们误读了史记中的文字。其实，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看韩非自己主张什么。笔者认为，在韩非的思想中，刑名法术以及黄老的思想都得到体现，并且也是韩非的追求和主张。黄老的道以及虚无思想在韩非的治国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它成为韩非思想的根。至于刑名法术之学，从他无论是师从荀子，还是吸收法家众长，进而主张法治及其术治的事实来看，他喜刑名法术之学是客观的。

其三，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而善于著书。他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而李斯自己觉得不如韩非。韩非口吃，显然是不善于表达，可能是有口吃病。也许，韩非由于口吃的原因而潜心于著书立说，扬长避短，因而显示出著书立说的长处。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显然也不是在语言表达上，而是在著书立说上面。看来，韩非在读书师从荀子期间，就显露出著书和思想方面的才华。否则，不会有李斯的以为不如韩非。善于著书立说，这是得到时代证明的，《韩非子》一书包含了诸多方面的内容，且多有创见，客观证明他确实是善于著书立说的人。当然，也有人认为，口吃是出言慎重的意思，笔者以为这种说法证据不足。韩非还是有口吃的不足。

其四，韩非一生的轨迹。韩非作为一个诸公子，一生都做过什么？前面交代了韩非曾拜师荀子求学；多次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著书十余

万言；曾出使秦国。求学拜师荀子，这很好理解，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盛行，且荀子也是著名的思想家，一般百姓都有求学的机会，何况韩非是一个诸公子。多次上书劝谏韩王，韩王不能用。至于劝谏的内容是什么，虽然没有直接记载，但从这里的文字可见，韩非是看到韩国衰弱之后才劝谏韩王的，韩国衰弱的原因可能就是韩非劝谏的内容：“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因而可以推论韩非劝谏的内容包括：修明法制，用权势控制使用臣下，富国强兵，求能人任法术之士，反对奖赏与功劳不符、所用和所养不一的现象。一方面《史记》的记载包含这些内容，另一方面《韩非子》的思想主张主要就是这些内容。韩国之所以衰弱，就是因为没有像韩非所说的那样去治理国家。数谏韩王而不能用，这里包含着两方面意思：一是说韩非的主张没有被韩国的君主采用，二是说韩非本人也没有被君主选用。至于这个不用韩非的君主是谁，我们并不清楚。因为韩非上的书和其人不为君主所用，于是韩非就把他劝谏的内容写成了书，通过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韩非不再劝谏，由数谏韩王转向著书立说，进而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这也就是说，韩非的一生主要是著书立说。韩非虽然不为韩王所用，但韩王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还是会找到韩非与之商量。《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史记·韩世家》有“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上引《老子申韩列传》）。有“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韩王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与韩非商量，我们以为这个韩王与不用韩非的韩王可能不是一个人，所以才有了韩王与韩非谋弱秦的事实；韩非在韩王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其商量，在遇到为难的时候让其使秦，这可能是因为韩非的谋略的价值及其影响。我以为，不用韩非的韩王是一个人，与韩非谋弱秦之策的韩王是另一个人，而用韩非使秦的韩安王则是文字记载清楚的。虽然韩非有过上书韩王的记载，有过与韩王谋弱秦之策的记载，最后也有韩非出使秦国的史实，但韩非一生

还是以为封建君主贡献治国方略为主要的內容，为了为封建君主献策，他研究历史和现实中的治国经验，研究治国的理论。因此，我们也可以有理由说，韩非一生做过三件事，即总结治国经验，研究治国理论，为君主贡献治国方略，而这都熔铸在《韩非子》之中。

其五，韩非因说而死。韩非知道劝说君主是一件难事，自己也知道劝说君主要注意什么，但他最终还是死于说。正是“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韩非最大的悲哀在于，他就是凭着自己的一张嘴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这个角度说，他不善言谈是有道理的，否则不会因为说而断送自己的性命。商鞅和吴起被杀，是因为他们都参与主持了变法，侵犯了一些人的利益，遭到了贵族们的报复，而他只是一次出使，在他国因说而被杀。韩非尽管没有被韩王所用，但他还是有一定声誉的，否则怎么会让韩非出使秦国，既不是官吏，也不是要员。从另一个角度说，韩非的名声还在于秦国急攻韩国，韩国竟然能够知道韩非可以去做存韩的游说进而阻止秦国攻韩（尽管在韩非出使秦国死后不过三年，韩国就为秦国所灭）。即便韩非有过与韩王商议削弱秦国的策略，再加上唯一的一次出使秦国，就导致韩非的死亡，这可以做以下推论：一是韩非太不会说话，二是韩非太厉害了。就这点来说，我觉得这两个因素都有。说韩非太厉害了，是说韩非的治理国家的思想观点，基本主张太厉害了，以至于秦王见了韩非的书都表示，能见上韩非一面死了都不遗憾。应该说，韩非的治国主张，能让秦王青睐，这是很现实的。因为韩非不仅告诫君主法、术、势并举，而且在其思想中有着一个治国方略的严密逻辑体系。由于韩非的这种厉害，让秦王觉得要见到他，不能让他回到韩国。而同学李斯的嫉妒也就不足为奇了。说韩非不会说话，这是有道理的。在某种意义上的口吃，好像也是说他不会说话。他对人的认识和分析过于尖刻、直白，在《存韩》和《初见秦》中的陈述，让人一听就清楚他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游说。此外，韩非出使秦国，对秦国的臣子攻击过于猛烈，什么谋臣不忠等语言，有多处表述，对秦国谋臣甚至秦王的刺激过于强烈。“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裙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荆人得收亡国。”“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魏氏为和。”“而谋臣不为，复与赵氏为和。……是谋臣之拙也。”这些均出自《初见秦》篇的话语，不仅让

秦国谋臣不高兴，而秦王也不能高兴。显然，谋臣不忠，是君王无能的表现。更甚的是，作为使者，韩非竟然对秦王的亲信姚贾进行揭发和攻击，导致秦王更大的反感。《战国策·秦策五》这样记载了韩非攻击姚贾如何失败的事实：“荆、吴、燕、代四国联合，准备攻秦的时候，秦王召集智囊班子六十人，征求意见，六十人都束手无策。这时，姚贾挺身而出，愿意出使四国，打消他们攻秦的念头。姚贾出使，果然顺利完成任务，‘绝其谋，止其兵’，改善了和四国的关系。秦王非常满意，重赏姚贾，任为上卿。姚贾的行为招来韩非的嫉妒，他在秦王面前攻击姚贾，说他是魏国看门人的儿子，出身低贱，又是‘梁之大盗，赵之逐臣’，有历史问题，不堪任用。姚贾针锋相对，提出了一个选择人才的标准回击韩非，在秦王面前为自己辩白，致使韩非无言以对。他说，明君用人，不是求全责备，不取他的缺点，不听别人对他的诽谤，而是看他是否愿意为自己出力，能否为国家立功，对于自吹自擂，徒有虚名的人，绝不应该看重。秦王认为姚贾说得对，仍对他信用不疑，而杀掉韩国派来的贵公子韩非。韩非对姚贾的中伤，不但没起作用，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有部电影描写汉人周光第在清朝皇帝面说皇子的不是，尽管他是为大清的前途着想，说的也是实话，并且是在皇帝一再鼓励要求之下才说的，但同样遭到皇帝的不满。道理何在，这就是触到了皇帝的逆鳞。这就如同自己的孩子自己打骂可以，如果别人动手动脚就会产生不良后果。还有，韩非总是过于自负，总觉得天下只有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总表白自己的忠贞而诽谤别人。如上这些内容可见，韩非确实不会说话，因而导致自己被杀。韩非知道说难而为说而死，这是他的悲哀之处。从经验上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是非常有道理的，韩非的结局也印证了这个道理。韩非在《难言》中不仅分析了难以进言的原因，而且还用别人进言的经验来说明问题，他明明知道愚君不听从别人的劝说，知道君子进言难的道理。在《说难》中，他清楚进言的困难在于如何了解进言对象的心，但他还是没能把握住分寸，看来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确实存在距离，这些仅仅用不畏死亡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

上面是通过对《史记》中《韩非传》分析获得的有关韩非生平的情况，这也应该是韩非生平的基本情况。韩非贡献给世人的是他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他的生平事迹及其理想追求虽然对于励志来说能有所帮助，但相对于思想观点本身来说，还是皮毛。因而，笔者对韩非基本情况仅做

以上交代。

二、韩非治国方略解读

治国方略按照现在的理解，是指治理国家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带有全局性的可以公之于世的根本原则和方针。这种理解，不仅把治国方略和治理国家过程中君主使用的不能公之于世、不是涉及全局的权术区别开来，而且也把它与治理国家中的临时性策略区别开来。也就是说，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方面是治理国家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经常性的策略原则和方针；另一方面是能够公开的进行宣传并且可以公之于世的不是深藏内心的东西。这样的治国方略，既便于被人们理解接受，也便于统治队伍中的各级官吏知晓、理解与有效地执行。

韩非有没有治国方略，韩非的治国方略是如何体现的？论述韩非治国方略，遇到的第一个质疑就是：韩非并没有亲自参加治理国家的实践，“他从来没有机会以执政者或参政者的身份谈论政治”^① 怎么能有治国方略的存在？是啊，韩非的确没有像商鞅、吴起等人那样，有亲自参加治理国家实践的机会。他数谏韩王而不能用，这个不能用，既是他本人不能被用于治国大臣施展治国抱负，也是他的治国思想不能为君主所用。而这，并不影响韩非治国方略存在的现实性。“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韩非数次书谏韩王，不能为韩王所用。韩非痛恨韩国君主治国不能修明法制依法治国、不能依靠君主权势驾驭臣下、不能走富国强兵之路、不能任用能人为官的现实，进而写了十余万言。这十余万言，就是今天呈现在《韩非子》中的五十五篇治国宏论。这五十五篇治国宏论，有韩非那个时代以及前世治理国家的经验，有韩非自己对治理国家策略方针的思考，有韩非奉献给封建君主的基本方略。可以说，韩非一生就做了这三件事：总结他人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思考治理国家的策略原则方针；为君主奉献治理国家的策略原则。韩非的治国方略，不是韩非自己

^① 杨义《韩非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页。

治理或参与治理国家时奉行的方针大略，而是韩非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奉献给封建君主的治国方略。韩非治国的方略和韩非的治国方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韩非在治国或参与治国中的方针原则，由于韩非没有这个过程，因而文中不用韩非治国的方略。韩非是以文字的方式为君主提供治国方略的，他的治国思想都体现在他的文字中，因而我们说韩非虽然没有实践自己的治国方略，但却有自己思考的治国方略。我们使用韩非的治国方略这种表述方式，就是为了突出韩非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和参与治国实践，可他以文字的形式奉献给封建君主自己认为治国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针。这些，都体现在《韩非子》五十五篇治国宏论当中。

毋庸置疑，《韩非子》并非仅仅论述了治国方略，它是韩非所有政治思想的展示和表现。但是，韩非的所有政治思想都是围绕着治国方略展开的，治国方略是韩非政治思想的核心和基本线索。他所有的文字，都是围绕如何坚持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哪些是治理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展开的。固然，韩非的治国思想中，包括君主如何运用权术来驾驭群臣的内容，诸如选人用人的招法，尤其是那些带有奸诈性的驾驭群臣的技法，这些技法虽然是君主治理国家应该使用的有时甚至是必须使用的，但这些与治国方略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不仅韩非的治国方略是韩非思想的主线和核心，而且这个主线核心是一个体系性的东西。韩非提供给封建君主的治国方略是一个有着严密体系的方略，从循天守道到因情而治，从赏罚二柄到动无非法，从治吏引纲到务力耕战，这些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方略体系。当然，在《韩非子》当中，韩非并没有条理性地为我们描述治国方略的图画，他的治国方略散落在他所有思想之中。这种现实可以这样解释：一是韩非还没有机会条理化表述他的治国方略，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二是韩非的那个时代还不习惯我们今天的条理化，韩非的散论中蕴涵着基本方略，或者分散地能够论述治国方略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一点，韩非比马基雅维利要好许多，韩非不仅年代早于马基雅维利，而且就治理方略的内容来说，比马基雅维利要全面系统。马基雅维利比韩非优越的地方在于他直接参与治理国家的实践，甚至还参与了军队的建设。关于他们二者的比较，将在后面的文字中辟单章论述。

关于《韩非子》内容的真假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韩非子》中的有些篇章不是韩非所作，理由有很多。笔者认为，韩非子的书能流传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不排除其中有的思想与韩非子的基本思想

有矛盾，不排除其中有他人的痕迹甚至是文字，但只要体现韩非的主流思想和观点，就没有必要追究那些非原则性的东西。一方面，这种质疑没有确切的证据，另一方面，目前人们已经接受了现在的事实，承认《韩非子》的本真价值。笔者坚持《韩非子》中的思想观点都是韩非本人思想的主张，并且把它作为韩非治国方略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笔者将从《韩非子》的五十五篇宏论中来挖掘韩非子的治国方略，在诸多的文字当中抽象概括出韩非散论中的治国方略。或者，把韩非分而论之的治国方略集中起来系统表述。

三、关于本书的框架

本书力求清晰地展示韩非治国方略的图景，但不是韩非所有思想的展示：一方面，就韩非思想的精华来说，治国方略的内容足以展示其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韩非思想中蕴涵的东西非常丰富，很难在一本书里说清楚，就治国方略来说甚至也难以全面阐述，因而本书仅是对治国方略的阐释，或者说是韩非治国方略思想纲要性地解读。

本书设导论，简要介绍韩非的一般情况；关于韩非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志向，也设了一个篇目作了简要的描述。以此为基础，分别论述了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二柄、动无非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六个治国方略，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如果读者为了节省时间而更快地把握韩非的治国方略，请直接进入这个部分的阅读，也就是本书的三至八的六个部分。随后笔者分别论述了韩非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治国方略的实效、局限、影响和现代借鉴。

由于有限的时间和篇幅，不可能穷尽韩非关于治国的思想，因而只能是对韩非治国方略作以概要性的论述。同时，笔者也认为，这些概要性的论述，已经把韩非的治国思想的精华展现出来了。阅读本书，不仅能把握韩非的治国方略，而且也能对韩非思想的全貌有所把握。

第二章

变法图强——社会背景及韩非的志向

韩非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被称为春秋战国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过渡阶段。史学理论中，有把西周划为封建社会的，也有把秦汉划为封建社会的。其实这只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具体形式的争论，而对于历史发展中的内容还是有基本共识的，即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生产关系类型还是有共同的想法。春秋战国时期是从西周走过来的，这种社会的变革和历史过渡，是从西周到秦汉的过渡。如果承认西周是封建社会的话，那么这种过渡则是在一种生产关系和同样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变革。假如承认西周是奴隶社会，那么这种变革和转型就是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无论哪一种分法，学者们都承认改革和变革的内容。不过，似乎承认西周是奴隶社会的人和证据更充分些。因而，把这种变革和转型看成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为好。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是一个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的大转变，大变革，归根结底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当时社会各方面的转变，都是生产方式在社会各方面的反映，是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从春秋到战国，社会生产力有很大发展，这应该归功于铁在生产中的运用和生产工具的改变。“人类制造工具，首先是用石头，后来是天然的金属。在用金属的时候，首先是用铜，后来用青铜，最后才用铁。”^① 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种，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坚固和锐利的工具。铁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应用，而到战国时期就已经相当普遍了。铁器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铁器的使用，不仅使土地得以深耕，而且也使与耕种相关的技术得以发展，这使土地开发成为可能。在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西周时期的土地国有制受到挑战。过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铁器的运用和生产力的发展，使私田得以大量开发。这些生产力的提高，都使得旧有的生产关系跟它不相适应，冲破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适应这种变化，奴隶制被打破，封建地主阶级代替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这一时期，能够说明变革的材料，就是“初税亩”的出现。“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也占有劳动者本身。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劳动的果实全部为奴隶主占有。奴隶主只要像养活牲口一样养活奴隶就行了。因此奴隶主向奴隶无所谓征税不征税，奴隶向奴隶主也不存在交税不交税的问题。奴隶在奴隶主的土地上耕种，收入归奴隶主所有。只有在封建社会中，农民才能摆脱他们的奴隶地位，才能向地主租种土地，才会出现征税交租的事。所以‘初税亩’这个‘税’字，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封建生产关系转变的标志。”春秋时期的鲁国出现初税亩，使土地私有合法化，逐渐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者与贵族奴隶主相对立的情形。到了战国时代，新兴的土地占有者的势力越来越大。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秦国）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公开宣布废除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占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障。

新的土地占有者就是新兴地主阶级。（他们或是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或是从新兴商人或手工业农业小生产者上升过来。）地主阶级是当时的一个新阶级，在当时的社会变革斗争中，处于领导地位。他们凭借当时劳动人民对奴隶主的反抗，取得了统治地位。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加剧了剥削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国与国之间，统治阶级上层和下层之间，公室和私室之间，都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在斗争中，有的国家被消灭了，有的政权被篡夺了；在贵族中，有的没落了破产了，有的上升为新的贵族即成为新的当权的统治者。这些斗争尽管形式不同，但其实质都是旧有的奴隶制和新兴的封建制斗争的表现形式，都是新兴地主阶级与旧有的奴隶主阶级之间斗争的表现形式。在这场斗争中，由于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